

首部再现华南抗日战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首次披露战时广东省委鲜为人知的战斗征程

全景式史诗性作品 揭秘性非虚构文学

潜流

南方地下党血火纪录

王心钢 荣笑雨 李迅 著

毛泽东在窑洞来回踱了很久，直到火烧云完全消失，天空已是铁蓝的一片，似乎也没拿定主意。勤务兵说了句：“小鬼，去把恩来同志请来。”“是。”勤务兵应了一声，一溜烟不见了。不一会儿，周恩来笑吟吟地走进院子：“不是邀请我数星星吗？”“不是邀请我数星星吧？”“不数星星。”数人。“数人？”毛泽东作了个请的手势，请周恩来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恩来，时间不等人。”周恩来拿起石桌上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三个人名，纸条是周恩来写的。“主席想好了吗？”“广东，不能再这样冷下去。”的工作一直不顺利。是要有个能干的人去。“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共两党的争论已不是是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吐了一口烟道。会议，我们达成协议，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作战，必须经过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避敌锋芒避敌锋芒，开辟敌后游击区，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迅速开辟广东。要。”周恩来心里清楚，广东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广东。1926年，在国共精诚合作下，不仅在广州建立了东征、北伐的胜利。然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广东却成为工作开展的重灾区。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广东省委遭受三次严重的破坏，至1934年3月，中共在白区的有组织活动基本中断，幸存的党员转入隐蔽状态，数量也不断减少。次合作，正是重新打开广东局面的大好时候。“主席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全面开花，在全国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各通？”“中间那个。”“中间那个。”“理由？”“主席不是已经考虑好了吗？”“怎么讲？”“中间的名字下面画了一道杠。”“一笔露天机呀，你看怎么样？”好了。文韬武略，大将之才。”“恩来，你是不是早有预谋了？要不你也不会把他的名字写得最大。”要。”周非常必要。”周恩来心里清楚，广东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广东。1926年，在国共精诚合作下，不仅在广州建立了东征、北伐的胜利。然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广东却成为工作开展的重灾区。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广东省委遭受三次严重的破坏，至1934年3月，中共在白区的有组织活动基本中断，幸存的党员转入隐蔽状态，数量也不断减少。这几个人里，谁去最合适？”“中间那个。”“理由？”“主席不是已经考虑好了吗？”“怎么讲？”“中间的名字下面画了一道杠。”“一笔露天机呀，你看怎么样？”立摇武略，大将之才。

周恩来拿起石桌上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三个人名，纸条是周恩来写的。

“主席想好了吗？”

“广东，不能再这样冷清下去了。”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一直不顺利。是要有个能干的人去。”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共两党的争论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吐了一口烟道，“这次洛川会议，我们达成了共识，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作战，必须经过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会议的核心就是要避敌锋芒，开拓敌后游击区，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迅速开辟广东的根据地非常必要。”

周恩来心里清楚，广东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摇篮。1926年，在国共精诚合作下，不仅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而且取得了东征、北伐的胜利。然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广东却成为工作开展的重灾区。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中共广东省委曾遭受三次严重的破坏，至1934年3月，中共在白区的有组织的活动基本中断，幸存的党员转入隐蔽状态，数量也不断减少。现在国共提出第二次合作，正是重新打开广东局面的大好时候。

“主席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全面开花，在全国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这几个人里，谁去最合适？”

“中间那个。”

“理由？”

“主席不是已经考虑好了吗？”

“怎么讲？”

“中间的名字下面画了一道杠。”

“一笔露天机呀，你看怎么样？”

“就他，没人比他更好了。文韬武略，大将之才。”

“恩来，你是不是早有预谋了？要不你也不会把他的名字写得最大。”

“这么说我也是有意为之喽？哈哈，瞒不过你呀……只是，身边的得意门生，主席舍得让他离那么远？”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嘛。”毛泽东说着，把两边的两个名字画掉，留下了中间的一个名字。

中间的这个名字是：张文彬。

“去把文彬同志请来吧。”毛泽东叮嘱了勤务兵一句。

别支部的工作。

同年12月上旬，惊闻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秘密合作，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住进了临潼清华池。张文彬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精心部署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万人游行活动，以此为契机引发各界民众对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的抗议。国民党西安当局出动警察驱赶游行队伍，打伤数十名学生，张文彬抓住机会组织更多的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这次请愿行动规模空前，民众情绪悲愤，秩序良好，对其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捉蒋行动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介入事变的调解谈判，张文彬是代表团成员之一。由于有张文彬等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代表团对事变的全过程有着具体翔实的了解，对于迅速地确定释蒋的决策打下基础，有力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张文彬四人为中共代表同国民党谈判，张文彬被任命为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

1937年春，红军西路军在无根据地和后勤保障的条件下，孤军深入，几经浴血奋战，在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两万余官兵被俘的被俘，失散的失散，还有不少年轻的生命葬身大漠草原和马家军骑兵的屠刀之下。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西路军官兵的安危。2月，电示周恩来和叶剑英要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

叶剑英长征时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接到中央指示后，心中十分焦急。由于正在参加国共谈判，他和周恩来商量后，将这项工作交给张文彬负责，并一起研究了营救方案，决定一方面设法到回民中间摸清情况，看有多少人散落在群众之中；一方面托关系与青海、甘肃当局上层交涉，要他们交还被俘人员。周恩来特地交代张文彬，要重点营救被包围在黄番寺的500余名红军指战员，只要马家军队不伤害被围红军，可以交枪和平解决。

正当张文彬积极参与营救红军战俘行动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通知，让张文彬到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便预感到又有新的任务。

3

“报告。”张文彬给毛泽东、周恩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急切地说：“两位首长，会议结束了，是不是有新任务，派我上抗日前线去？晋察冀还是华东？”

毛泽东宽厚地笑着说：“你这个伢子，蛮有脑子的，再往远处想一下……哎，莫急莫急，事情要做，饭也要吃，你我今天不谈工作的事。今天我是请你来吃爆炒辣椒和红烧肉的。”

张文彬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过政治秘书，知道毛泽东好这口，听说有肉吃，他高兴地把袖子一挽：“好久没吃红烧肉了，今天‘打牙祭’，我去帮厨。”

毛泽东打心里喜欢湖南小老乡，他冲张文彬摆摆手：“坐下，今天老乡请老乡，你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两个好好聊下子天。如果要任务的话，你找恩来同志要去吧。”

周恩来接了一句：“难得主席今天心情好，咱们边陪主席吃红烧肉边聊天，任务的事吃饱肚子再说。”

“好的。”张文彬嘴里应着，转身跑到厨房帮上菜。

饭菜上桌，三人先从眼前的红烧肉聊到长沙臭豆腐，再从广州农运讲习所聊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继而聊到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直到刚结束的洛川会议。聊着聊着，自然切到了张文彬这次南下的新任务。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计划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长江局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为筹建长江局，周恩来在诸多红军将领中物色着合适的才干。他慧眼识珠，看中了张文彬。

周恩来对张文彬的真正了解，是在西安事变的那段日子。他看出了张文彬在党内青年干部中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年轻有为，斗争坚决，好学上进，既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历，又有从事组织建设和统战工作的实际经验，真可谓才华横溢，文武双全。

周恩来亲切地对张文彬说：“文彬同志，中央决定，你要脱下军装，到广东去开展工作，整顿和加强广东党组织，领导华南抗日救亡运动。”

毛泽东一旁意味深长地说：“东坡先生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你要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国统区工作，很不容易，你到广东要依靠党，要广泛依靠群众，建立统一战线，扎下根子，不妨长作‘岭南人’吧。”

张文彬原以为会派自己回部队上抗日前线指挥战斗，没想到是派自己到广东做地方党工作，有点愕然，但很快明白了两位领导人在广东布局的重要意义，爽快接受任务。

谈到兴处，周恩来拿起茶杯，从文件包里变戏法一样拿出一瓶边区老烧：“来，借主席的一道美味，红烧肉，一杯淡酒，算是饯行。下一杯，主席，我想是不是应该在广东喝了。”

毛泽东笑而不语，张文彬马上醒悟：这是在等自己表态呢。他起身端起酒

“想说的很多，一时又无从说起。”

“能理解。心绪浩茫似无边，一旦到了那里你自然就头绪清楚了，什么时候有想法都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说了。”张文彬“咔”地双脚一并，郑重其事地行了个军礼。

周恩来微笑道：“好，行动永远比语言有力，那我把你的这个军礼理解为承诺了。一个庄重的承诺。”说完把右手伸向张文彬。

张文彬握住周恩来的手，突然醒悟道：“你看我，周副主席，应该我来提灯才对的。光想着我自己的事了。”

“这话说反了，文彬同志，今天是我送你，也代表主席送你，我来提灯才是对的。主人照路客人行嘛……当然你也不是客人，而是一个远行人。”

夏夜的风吹来，把张文彬亢奋的心吹得呼啦呼啦的。

9月上旬，张文彬按照中央保卫局安排的路线，自延安南下，辗转西安、武汉、上海，抵达香港，再从水路秘密进入广州，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临行前，他向毛泽东辞别，并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深思片刻，伏案执笔，抄了一篇旧作《清平乐·会昌》给张文彬：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一 南粵救亡

1

尽管已经闻得到战争的气息，1938年的广州依然是以芳香和俏丽的节奏走进夏天的。

在西北，四月还是春寒未过时节，人们身上还裹着棉衣，广州却是一茬接一茬地开着各种各样的花，爱美的女人早已穿着款式各样的裙子和宽腿绸裤踢着木屐吧嗒吧嗒在青石板街上展示南国女人特别的美丽了。张文彬经常忙到凌晨一两点多才伴着沾着雨水的木屐声入睡。早上，他正睡得浓香，便被一阵阵激昂的歌声和口号声吵醒。

窗外，天边刚露出鱼肚白，晨风拂在脸上格外地清爽。他还习惯广东潮湿的天气，浑身哪都是黏黏的，也还不习惯目前的工作方式，在延安是明明白白工作，亮亮堂堂来往，现在什么都不同了，一切转入地下，一切都呈隐蔽状态，只有口号声和歌声又让他倍觉亲切，来广东以前，他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歌声和口号声。

自从1937年7月27日，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将炸弹砸在华南这第一都市后，广州临战的空气瞬时紧张起来，侥幸的人们还在臆测，战争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地区，华南紧邻英国殖民地香港，日军打华南就会得罪英国，因而不会轻易在广东开战，但随着战火的日益蔓延，特别是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日军加紧了南进的准备，巨石之下岂有完卵？

“晨呼队”是抗战初期羊城出现的一种特殊宣传队，是街头宣传发展的又一种形式。它主要由广州中小学学生和部分教师组成。每日天还未亮，队员们就斗志昂扬地集中在学校的操场上。一时间，军号声、铜鼓声大作，随即嘹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张文彬早已习惯“晨呼队”的歌声，这是特殊年代的“雄鸡高啼”。他翻身起床，用冷水擦了一把脸，顺手打开临街的窗户。

大街上晨雾茫茫，行人寥寥，屋檐下只剩几盏昏暗的电灯。“晨呼队”队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出现在街头，鼓号声打破羊城的宁静，惊醒了沉睡的人们。他们边走边高呼口号：“醒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队伍愈走愈近，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穿黑裙白衫剪短发的中学女生，她带头唱起了张文彬熟悉的《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军号声、歌声、口号声交替进行，在宁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嘹亮。

“晨呼队”所过之处，屋内灯火亮了，店门打开了，人们醒来了，有的群众还跑出来，和“晨呼队”一起唱救亡歌，一起呼喊口号。

张文彬不禁被这高昂的气氛所感染，口里轻轻哼着那激扬的救亡歌。

“大张，好兴致啊！”住在另一房间的梁广也被“晨呼队”唤醒，翻身起床，走到张文彬身后。

“老梁，你也起来了，不多睡一会儿？”张文彬看着梁广充血的眼睛，关切地问道，“你才睡了不到四个小时啊。”

“你不也是一样。又是脚步声又是歌唱声，我们睡得着吗？”梁广神情振奋地说。

梁广是广东新兴人，身材干瘦，说话干脆，办事干练。他是香港产业工人出身。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秘密工人运动，1931年夏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兼红军工人师政委，1935年冬赴苏联，在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应招回国，协助张文彬筹建中共广东省委。

梁广边用冷水洗脸边说：“还是家乡的水甜啊。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时，盛世才多次挽留我在他那里干，我都婉拒了。”

“你是老广，当然觉得家乡水甜，我到现在还有两个地方不习惯。”

“不习惯什么？”

“一是潮湿，二是没有辣椒吃，盐都不肯多放点，广东人也吃得太淡了。”

“你是为这个呀，那我叫他们做菜放咸点，给你准备辣椒酱……哎，大张，我回广东是为了在熟悉的地方更好开展工作，可不是为了家乡水啊。”

“你看你看，我说句菜淡了你就急了，说实在的，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工人领袖。”张文彬感慨地说，“我到广东半年多来，抗日形势发展很快，可以说，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地推开，窗玻璃变成了碎片，窗帘被直直地吹出了窗外。而回落的时候则已经变成了一缕缕碎布条。路上到处都是燃烧的汽车和扭曲的电线杆。很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树枝的旁边到处都散落着人的胳膊、腿和头颅。

“小鬼子又欠下了一笔血债！”张文彬望着街上的悲惨局面，感到耳际传来不均匀的呼吸，他回头看看，身边的邓戈明吓得脸色苍白。

“小邓，别怕，见几次就适应了，战争就是这样的。从敌机轰炸的次数和规模日益增多的情况来判断，这次的轰炸还是相对较小的，或许规模更大情况更严重的还在后面，斗争会越来越残酷，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张文彬安慰道。

邓戈明点点头，稍稍踏实：“张先生，我不怕，飞机一走我们就去救人！”

“这就好。”张文彬按住她的肩头，“中国人是炸不垮的！”

邓戈明啜嚅了一下，张文彬问：“你想说什么？”

邓戈明赧然一笑，满脸潮红：“张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突然，什么也不怕了，真的。”

张文彬欣然不已，一个战士成长了，鼓励道：“哈，因为你长大了嘛。只是，我们还要面临更多的空袭呀。”

正如张文彬的所料，日军对广州的轰炸愈演愈烈，其中规模最大，受害最为惨重的轰炸是在5月28日至31日。据记载，5月28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日机70余架分三批空袭广州市区，投掷300磅至500磅的炸弹150余枚，中山纪念堂、昌华大街、逢源三巷、田庆新街、荔湾北区、中央公园、合华路等地灾情最重，烧毁房屋600余间，炸死平民600余人，炸伤1000余人。沿河岸一带停泊的大小船共有20多艘被炸沉，水面上漂浮着100多具肢体残缺的尸体，还有不少受伤者在血泊中呼号挣扎，十分凄惨。

正在广州办《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含着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有名的通讯《广州在轰炸中》，描述了广州遭轰炸的悲惨情景：

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的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货汽车上的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倒坏了烧毁了民房，炸弹片，一排排的用芦席盖着的尸首，和由红变褐、由褐变黑了的血迹！路上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倒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风吹着，这肠子在慢慢地摇晃……

3

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叶剑英1938年5月1日回到广州。青年的叶剑英与广

州结下不解之缘。

1920年夏，23岁的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打回广州，并在孙中山总统府警卫营任职。1922年6月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在广州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辞去第一军第二师长职务，随即奔赴武汉，任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叶剑英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并随张发奎的部队回到了广州。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犹记得12月11日那风雨如晦的夜晚，枪声、炮声、冲杀声仍在耳畔响起，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岁月蹉跎，光阴似箭，从广州起义失败至今，离开广州已11年，重踏上羊城这片热土，叶剑英内心激情澎湃。如今，风云变幻，为抗外侮，昔日的敌人已成为盟友，谈笑风生中，统一战线的理念犹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已为社会各界广为接受。

此行，叶剑英以到香港看病为名路过广州小住，国民党广东当局上层人物闻之，纷纷以各自方式给予礼遇。因为对他们来说，叶剑英不仅仅是其老乡、同学、东征北伐时的战友，而且他还任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共中央代表，在西安、在南京、在武汉，到处可见他游刃有余地斡旋于各种势力中的儒雅身影。

出人意料的是，叶剑英并没有住在广东高层为他准备的宾馆别墅中，而是低调地住在其弟叶道英家。

听说叶剑英回到广州，中山大学、广雅中学等纷纷发来邀请函，请叶剑英为师生演讲。

5月2日，风和日丽，叶剑英来到中山大学。他本是应学校萧冠英先生之约演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但此时日军正向武汉步步进逼，并有传言要进攻广州。广州民众中弥漫着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因而，根据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问题，他临时改题，主要讲了“日寇会不会来进攻广东”、

而形成以余汉谋为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尖锐对立。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部署，广英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名义走访了余汉谋、谌小岑、钟天心和曾养甫等国民党广东当局负责人，向他们宣传、解释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表达我们抗日合作的诚意。总的来看，‘七·七事变’后，各派系的头面人物纷纷摆出开明姿态，亲自出马组织抗日团体。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他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民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企图利用民众的抗日情绪笼络人心，争取群众，以巩固和扩大本派系的地盘。但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是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的。”

叶剑英插道：“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那么，你们在群众救亡方面成绩如何？”

张文彬接着说：“群众救亡运动热情高涨。我们通过统战工作间接掌握或直接领导了一批抗日救亡团体，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广东被誉为‘统一战线模范省区’。广州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成为国统区除汉口外第二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听完介绍，叶剑英称赞广东省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打开了局面，为全国的统战工作带了个好头。随即，对各方面工作，一一作了重要指示。

“刚才剑英同志说到营救被俘人员，我这里得到一份最新情报。”张文彬掏出一封密件交给云广英，“现在国民党南雄县政府监狱内关押着六七百名‘政治犯’，他们都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斗争的我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在历次战斗中被国民党军队所俘虏，其中有不少我军高级指挥员，处境十分困难，随时有生命危险。这些人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是抗日的有生力量。现在，我把营救南雄‘政治犯’的任务交给你们，必须不惜代价把他们救出来！”

云广英看过密信，神色凝重起来：“上个月，我通过与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洁之交涉，已从广州南石头监狱救出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现在，要国民党广东当局把南雄这批红军战士放出来可能更不容易，因为他们对在粤赣边坚持游击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恨之入骨，是花了很大代价好才把这些战士抓到的，对于他们来说，放了这些政治犯无疑是放虎归山，而对于我们来说，能把这些战士救出来则是无形中为抗日救亡增加一股有生力量。我们是得想一个周全的办法。”

张文彬英眉一挑：“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党建设抗日统一战线，首先就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这种大环境对我们有利。但在一些地方，某些顽固分子也在趁机秘密暗杀我狱中人员，我们不能让这些情况发生。”

叶剑英在一旁叮嘱说：“我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都要向对方提出释放一切

二 营救战俘

1

人们常用“白云珠水”来美誉广州，其中，“白云”指的是白云山，“珠水”指的是珠江。白云山在广州市北部，由多座山峰簇集而成，最高峰摩星岭海拔382米。每当雨过天晴时，山上白云缭绕于青山绿水间，景色十分秀丽，由此得名“白云山”。白云山气势磅礴，山峦起伏，沟谷纵横，自古就有“羊城第一秀”之称。但战争年代，这里是最好的战略要地。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布下重兵，把它建设成防守广州的军事重地。

余汉谋，字幄奇，1896年9月22日出生，广东高要人，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从步兵排长干起，从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到军长，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8月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9月授陆军中将军衔任四路军总司令。1936年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再度反蒋。余汉谋通电各广东将领支持蒋介石中央。陈济棠事败出走香港，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主任，取代陈济棠成为广东军政首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余汉谋长得脸宽眉粗，眼神犀利，圆厚双肩，忠厚表情里，夹着一丝狡黠。作为华南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深知广州是华南重镇，又毗邻港澳，地位尤其重要。

“丢那妈，又想让老子派兵。”在白云山脚一个掩蔽所里，余汉谋恨恨地把电报揉搓成一团，掷到地上。

刚进门的莫雄正好看到这一幕，笑吟吟地说：“幄奇兄，你这是唱哪一出啊？”

余汉谋见是莫雄，顿时换了笑脸：“莫大哥，您来得正好，快来评理理。”

余汉谋与莫雄是东征时的老交情，他告诉莫雄：“4月初，我就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情报，说日军现在台湾集结兵力约8万多人，即将大举向广东进犯。当时广东方面曾一度紧张，第四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到翁源，但事隔不久，军委会又来一次情报，说日军已经改变战略，准备先打下武汉。这样一来，广东军政方面开始松懈下去。而蒋介石为了守住武汉，竟然从粤军中抽调了6个师近半数的兵力去参加会战，我跟老蒋诉苦，说现在广东防守格外空虚，已无兵再派。老蒋则认为日军倾尽全力在武汉会战上，不可能还能抽出兵力在其他方向上进攻。”

对于广东的军事情况，莫雄自然了如指掌。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即以大本营的名义下达了建立第四战区的命令，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闽、粤及广西南宁、梧州等地区的防守任务，并保护海、陆军的补给线路。由于广州毗邻香港，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们认为：日军如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的利益，可能引起英国的干涉，由此判断日本不会贸然进攻广州，因而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直到如今，第四战区的机构尚没有建立，仅以余汉谋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广州方面的防务。

一旁的广东省主席吴铁城插话说：“我们得到情报，本来，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是打算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再抽调兵力来进行进攻广州的，谁知在武汉会战中国军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军大本营等不及了，准备抽调三个师组成二十一军先打广州。我专门向重庆作了报告，可是老蒋居然以为这是日本人故意制造出来的‘假’情报，试图让国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

余汉谋紧锁眉头说：“第四路军经老蒋一再抽调部队到省外作战后，实际上控制的部队仅得6万人左右。虽然如此，我仍依照既定战略计划，以第一五一师两个旅进驻大亚湾第一线岸防阵地与惠阳淡水间的第二线阵地，第一五三师与第一五八师进驻宝安、新塘，作为第一五一师的依托。第一八六师进驻第三线阵地，守备增城。外围并以独二十旅驻佛山，独九旅驻中山，第一五四师驻花县，作为外线策应部队。在近150公里的纵深中第四路军投入了4个师8个旅。但我清楚，如此分散用兵，要面对强大敌人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是不容易抵挡的。”

莫雄摇摇头：“老蒋这人我知道，对军事喜欢瞎指挥。依我看，你别理他！这援军能拖则拖。武汉迟早守不住，如果再把广州给丢了，这本就亏大了！”

余汉谋苦着脸说：“你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你说，老蒋是这么好应付

吴铁城早已与余汉谋通了气，今天两人请莫雄来就是“激”莫雄上任的。余汉谋也帮着说好话，南雄真的是广东抗日大后方，需要莫大哥这样的人物经营。莫雄架不住两人左劝右劝，不好再推托，心一软，答应下来。

吴铁城喜得大叫秘书，马上给莫大哥写委任状。

余汉谋也非常高兴，许诺说：“你这上堂堂的少将参议去当个县长，是有点那个。这样吧，我封你个广东大后方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主管南雄、始兴、乐昌、仁化四个县。如何？”

莫雄逼了一句：“你不能只给个委任状开张空头支票吧？”

余汉谋爽快地说：“好，我送佛送上天，再送你10支驳壳，2000发子弹，再派一辆新的军用卡车送你到南雄赴任，风风光光的。”

吴铁城拍手叫好：“还是余长官大方，哈哈。”

2

“文彬，有两个好消息。”云广英推门而进，见张文彬正伏案备课，便打趣说，“你也当起教书先生来了。”

“是啊，省委最近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央长江局关于加强党内教育的意见。现在发展新党员很快，省委决定先举办两期党员训练班，每期培训班为38人，时间一个月左右。我和梁广、林平、罗范群等省、市委领导人担任授课教师。”张文彬边整理教案边介绍道，“受训结束后，学员将被派到省内各县、区党组织担任领导骨干，大规模发展党员。”

“嘿，内容挺丰富的嘛。”云广英看了看桌上放着的课程表，有《中共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不由得夸道。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张文彬起身给云广英倒了一杯白开水。

“先给你看这个。”云广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蓝色小本本。

张文彬细看，竟然是国民党军队的一本电报密码本，喜形于色，敲了云广英肩膀一拳头，道：“你这个家伙，果真有两下，李克农同志见到了，不高兴得跳起来才怪。”

“我也是通过关系偶然得到的。”云广英笑着答。

“另一个好消息又是什么呢？”

“你不是要我营救关在南雄监狱的红军战俘吗？现在机会来了。我打听过了，莫雄现到南雄当县长，可以通过他帮忙。”

布餐馆，这是一座面向东南的六层骑楼，外观为西式设计。1938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廖承志以新华日报广州分社名义，在餐厅里开了一次“特别的”读者招待会。

原来，眼见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当局不禁心存芥蒂。8月20日，国民党在汉口悍然宣布解散中共领导的三个抗日民众团体，强令《新华日报》停刊三日，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广东国民党顽固派随即呼应。当时，“牺盟”（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蚁社”和“民先”（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全国著名青年团体的多名代表来广州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这些青年代表原住宿在广州河南，因避日机夜袭，被诬为暴露目标被当场拘押起来。新华日报广州分社记者对此事件的报导发表之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十分恼火，无理命令广州分社停刊三天，并逮捕了“民先”代表于光远。香港的一些报纸立即作出反应，大叫“国共分裂了”。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国共之间的合作不可能一帆风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共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广东当局特别是其中的右翼顽固派又感到害怕，因而不时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这次国民党广东当局抓人、封馆事件比以往的事件性质更为恶劣。张文彬特地到香港找到廖承志。

张文彬与廖承志几乎是同时到广东的，他了解廖承志的忠厚诚实的为人、卓越显著的才华和工作能力。

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祖籍广东惠阳县。青少年时代，廖承志跟随父母为革命奔走广州、上海和日本。1924年8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愤而脱离国民党，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红军，任中央川陕委员，工会宣传部部长和红四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曾面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要求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用以办理接受海外华人援助的款项和药品，办事处不挂牌，是秘密的，以维持英国的中立地位。这个要求得到英国当局的应允。1938年1月，刚刚新婚不久的廖承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香港，与潘汉年等一起，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连贯作为办事处公开负责人。

张文彬在简明扼要地介绍完最近发生的反共事件后，对廖承志说：“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将要在延安召开，在这节骨眼里遇到该事件，我们要找个妥善的方式澄清事实，反击这股逆流，把人救出来。”

廖承志来回踱了几步，说：“我即回广州处理此事。”

临开会前，张文彬紧急通知廖承志，接到情报，国民党顽固派得知廖承志要

从山上下来的土匪足有二三千，受招安后，非常不习惯部队严格的操练，他们吊儿郎当的，常常不肯出操。莫雄以此为借口，对钟寿山谈起此事，最后商定将这些土匪全部遣散，每支枪发10元，收枪发钱，并给他们“解甲归田，回家务农”的证明书，同时，推荐钟寿山为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

吴铁城不禁惊叹这莫大哥果真厉害，三下五除二，就把南雄纷乱的局面“搞掂了”。

“莫县长，您的密件。”这天早上，莫雄刚起床，文书把一封加盖火漆的邮件递到面前。

莫雄瞟了眼上面的邮戳是广州的，缓缓接过邮件，说了句“退下吧”，文书微微地躬了下腰，知趣地退下。

这密件是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云广英寄来的，信不长，但言辞恳切，一片真诚。莫雄看完，端起水烟默默地吸着，陷入深思中。

南雄县政府设在城中孔庙内。原来的县政府并不设在这里，由于红军三次攻进南雄城，将县政府及监狱都给烧光了，故县政府只好暂设在孔庙，并将县监狱也设在这里。这座孔庙面积颇大，县政府设在大堂之后，大堂前两旁低矮的走廊用木板和杉条钉成一长排的牢笼，里边竟密密麻麻地关押着几百人，不少犯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站着。正是三伏天，牢房如蒸笼，犯人脱光了衣服，仍汗流浹背。那些看守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毫无“人道”可言。牢笼中散出的冲天臭气，使过往的人不得不掩鼻而行。

莫雄一进孔庙，就见两旁牢笼中的人发狂般地站起来，朝着他喊：“冤枉啊！”顷刻间，整座孔庙被这悲愤的怒吼震撼。由于一上任就忙于处理钟寿山事件，莫雄无暇理会这些犯人。

此时的莫雄并不认识云广英，接到八路军代表的这封信，颇感突然。在信中，云广英请求莫雄设法解救关在县府监狱中的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和进步人士。莫雄表面平静，内心却波澜起伏，真想不到关在牢笼中的犯人竟有这么多共产党人。

用过早餐后，莫雄特地穿上少将军服，随即叫县政府吴监狱长火速到他这里来。经监狱长介绍，这才知道这些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及赤卫队员等，都是余汉谋的剿共部队在湘、粤、赣边区抓到的“战俘”，解到南雄来寄押的。

莫雄接过吴监狱长递上来的犯人从花名册，仔细一看，有近七百人。

莫雄随后主持召开县政府会议，摆出长官的架势，向手下的秘书及科员训示。说着说着，他指着一旁的监仓说：“你们看，天气这么热，这些犯人多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像这样下去会死人的，而寄押他们的那些部队已开

拨到浙江、上海一带抗日前线，不知何时才能回广东，要是等到他们回广东才处理这些犯人，这些人早就‘瘦死狱中’了。大家说说，我们该咋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不成？”

莫雄威严地扫了众人一眼，见大家面面相觑，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看方法很简单，把这些所谓的犯人统统放了，一个也不留！”

此话一出，犹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科员秘书听罢，始是惊愕，继而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说：“县长大人，你何苦要这样做呢？他们死在狱中，那也是不得已的事，何况又不是我们抓来的。这里边的几百共产党分子和俘虏兵都让你放了，人家不说你通共，也说你贪赃枉法，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更有的说：“这是余总司令的剿共部队寄押在南雄的共党分子，你只是南雄县长兼游击司令，你没有权这样做，且不说六七百人，就是六七个人也不能放，若然你一定要放，也要请示余总司令！”

“丢那妈，说这么多有鬼用？”莫雄不禁怒火中烧，“余司令那里我自有解释。究其实，这些人里有几多是所谓要犯，你们不比我清楚？如果这几百人死在我任上的监狱里，我也担个说不清的责任。你们怕事，你们就当不知道，我莫雄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说放，现在就放！与你们无关！谁要拦着我或者告密，我连他一起放。”

这些人大概不知道莫雄会如此震怒，吓得缄口不语。

莫雄站起来，用命令的口气喊道：“吴监狱长，你听清楚我刚才的话没有？”

吴监狱长从没领教过这样的县长，哪敢怠慢：“下官一定遵命执行。”

莫雄大声说：“好，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把人统统给我打发干净。”

第二天，莫雄端坐高台中，亲自督办，并叫县政府承审员黄仲宏坐在旁边协助他放人。

一切准备就绪，他命监狱长把全部犯人分批召集到县政府大堂中，又叫两名狱卒专给犯人打开脚铐，由他按花名册上的名字逐个喊上前来，验明正身。

黄仲宏则给每个人都发了事前由莫雄嘱咐县政府油印的“释放证明书”，上面说明：“仰沿途军警查检放行。”证明书上签有莫雄的名字，并盖上县政府和游击司令部的大印。同时，还发给他们每个人1元银毫、5斤大米。

莫雄边看花名册，心里甚是恼怒。被囚的除绝大部分是剿共部队寄押在这里的“犯人”外，还有一些是县政府抓来的，或警察局寄押于此的。从卷宗上知道，警察局和县政府抓来的“犯人”，中共党员占少数，其中警察局寄押于此的犯人，又多数是胡乱抓来的。如有一对农民夫妇，某日担谷进城，不知如何得罪

了守城的警察，于是便被毒打一顿后，给寄押进县政府监狱，而县政府则照收不误。

念着念着，堂上抬上来一个已奄奄一息的哑巴，是被警察局无故控为“汉奸”抓进来的。莫雄见状大骂，这样的人你们也抓？俗话说“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天下还有比这个悲惨的人吗？你们这些警察老爷，只顾着有钱就放人，没钱的就被你们长期寄押，这天理何在？谁敢说莫某放错了人，我一枪崩了他！

旁边的警察、狱警自知理亏，一个个不敢吭声。

就这样，莫雄花了3天工夫，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地干，终于将全部在押人员悉数尽释。

见“犯人”一个个离去，莫雄全身从未有过的轻松，侧身问一旁的承审员黄仲宏：“牢里还有人吗？”

黄仲宏翻着案卷，支支吾吾说：“没，没有了。只是……”

莫雄听出其话中有话：“只是什么？快说！”

黄仲宏把案卷递上，小声说：“还有24名中共高级干部关在另一处秘密监狱。”

莫雄细看这些“犯人”的档案，上面说明他们是粤、湘、赣地区红军或地下党的干部，已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或15—20年徒刑。

黄仲宏小声提醒说：“县长大人，这些可是共党要犯，可不能放啊！”

莫雄本想马上将这批“要犯”释放，但听黄仲宏这一番话，觉得有理，那几百名寄押的俘虏因未定罪判刑，放了还好说，而这24名“要犯”则是已判刑立案的，要是随意释放，上面责怪下来真的就只好交差了。

莫雄想了想，对黄仲宏说：“你说得对，你马上以南雄县政府拟一份公文给余汉谋长官，要求释放这批‘要犯’。”

黄仲宏一听目瞪口呆：“你真的要放这批人啊！？”

“放。”莫雄一声沉吟。

“如果万一……”

“叫你写你就写，啰鸡巴嗦！”莫雄眼一瞪，黄仲宏不再敢吭声。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有些纳闷，这莫雄可是堂堂地国民党少将参议、一县之长，他怎么就凭素不相识的八路军代表云广英一封信，就这么大胆地释放政治犯，一点也不害怕吗？

其实，这莫雄早已是“白皮红心”之人，为共产党办事早有“前科”。

在广东，莫雄算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出身贫苦，只读了三年私塾，就从英德